

序与跋

唤醒鉴识旧岁月

——《老烟台旧事》序言

宋世民

书斋夜话

我心中的 胶东作家李杭育

张凤英

记得多年前,我第一次见到姜振友先生时,称他为老师,他坚决不答应。以自己年龄比我小一轮、见识学问浅薄为由,反复说:最亲切的称呼是叫我的名,振友!看他那认真劲儿,也只能从命认可。直到今天拜读他多年来的心血结晶《老烟台旧事》书稿时,我仍习惯直呼其名振友,尽管他已成为乡土文史界一名学者,但此时改换习称反倒感觉生分。

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振友,是为借阅原版《烟台要览》。之前曾求助几家藏书单位皆无果,有人提示,你问问姜振友老师,他可能有。心中疑惑,此书在烟台城内大概仅存一部,由烟台市档案局收藏,因为珍贵,不轻易出借,民间收藏还没听说。恰巧我与振友相识多年,从没登门,也就借此机会走进他的书房。

第一印象,四壁皆书。面对三千七百多册藏书,如同置身图书馆。他随手抽出一册高价购买的《烟台要览》影印本,瞬间实现我心中渴望。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原来振友年轻时就喜欢读书,想看哪本书,不辞周折必买来细读,为深入理解、吸收书中精华、巩固所学知识,还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。起初读书是为了丰富知识,提高工作能力,实践中逐渐倾向于研究烟台历史文化。通过阅读引导自己进入一个更激动人心,更有价值的世界。

在他眼中,乡土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,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优秀文化资源。如何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,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,离不开当地历史文化研究者的无私奉献。通过唤醒点亮旧岁月的艰苦努力,让老烟台旧事承载着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,走进千家万户。这种使命感让退休后的振友青春焕发,将被历史尘封或群体遗忘的许多烟台旧事,逐一整理出来。

振友不仅与人合作出版了《老烟台武术》一书,还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了40多篇有关烟台文史的文章。也因此连续多年被烟台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评为优秀会员。他这些从不同角度展现烟台历史的文章,都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选拔出来的。其中所表现的政治事件、生活习俗、行业风情、字号来历、典型人物、建置变更等,都带有烟台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,为当代读者见识旧时光,开辟一个新视角。

振友通过多年历史文化研究实践,对历史考察的目的有深刻体会,这不是对历史的重新展示,而

是通过对于历史的分析和概括,以期得到启示和教益。许多沉积封闭的历史资料,不可避免地带有原作者自身的倾向性,要摒弃过度解读和简单判断,还需要研究者通过认真调查,获取已有资料的可靠依据,藉此拓展视野、清醒认知。所以他在调查历史事件、人物的过程中,注重准确抓住具有较广泛社会影响的失实传闻,坚持不懈地追根究底。力求理性全面了解史实各方不同观点的依据来源,还原坚实可信的历史原貌。

例如,对奇山所裁撤时间及奇山所城墙楼铺的建筑设置等问题,通过对历代有关志书的深入研读和缜密分析,终于获取更加接近史实的新收获。通过《奇山守御千户所杂考》一文的清晰解读,改变了之前通过有限知识想象出来的结果。还有对于烟台何时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时间问题,传统认知为1934年。他在广泛查阅有关史料时,发现新的线索,顺藤摸瓜,以全新证据显示,应以1933年10月16日,烟台特别行政区专员张奎文举行就职典礼日为特区成立时间。至此,他秉笔直书,写下《民国烟台何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小考》一文,终结了这个长期以来的时间悬念。

纵观振友多年来刊发的有关探索烟台历史的文章,常会出现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史料与证据,这些鲜为人知的“旧新闻”,以独特视角,为当今社会贡献了一段有别于民间约定俗成的历史认知,让读者透过文章表面,看到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和辗转曲折、千丝万缕的来历,去寻找它的历史真面目。

重视历史、研究历史、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优良传统。坚定文化自信,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。为让远去、模糊的烟台历史鲜活灵动地展现在当今读者面前,让读者能够触摸事件过程、与历史人物对话,姜振友先生在《老烟台旧事》的写作过程中,做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。

《老烟台旧事》一书,汇集了有关烟台历史的考证文章40余篇,涵盖了古近代烟台社会的多个方面,是作者多年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结果。其中文章注重史料,充实可靠,观点明确,文笔朴实流畅,可读性强,对于古近代烟台历史研究具有积极作用。作为一本宝贵的历史实录,相信它必将成为现代烟台文史研究的传世成果。振友至今仍笔耕不辍,在《老烟台旧事》问世之日,期待他的新作品层出不穷。

第一次知道李杭育先生,是在杭州潮湿的梅雨季。那时我刚迁居江南半年,总不适应这缠绵的雨,便常去图书馆借些旧杂志打发时光。就是在1985年那期泛黄的《江南》上,我读到了他的葛川江故事——那些文字竟像一把钥匙,突然打开了我想象里的北方。

说来奇妙,一个在江南成名的作家,笔下却带着胶东海风的咸涩。后来才知道,李杭育确实是胶东人。这便解释了他文字里那种特别的气质: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文坛上,他像一棵移栽南方的白杨,枝叶间还保留着北方的挺拔。

我最爱他写的葛川江。别人写水多是柔的、软的,他的江水却是“有骨头”的。“葛川江的落日像一颗砸进江心的铜钉,把整条江钉在大地上”——这样的句子,让我这个北方人读得眼眶发热。那不只是写景,那是把北方人血脉里的硬气带进了温软的江南水乡。记得有个傍晚,我在西湖边看落日,忽然想起他笔下那个在江边修补渔网的老人:“他补网的姿势,像是在给这条江缝合伤口。”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他写的从来不只是风景,是人在天地间的姿态。

但真正让我理解李杭育的,是他沉寂二十年后的回归。2015年,《公猪案》问世。这部小说来得太突然,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。朋友们都说,等了二十年,等来的竟是一本写猪的书?可当我翻开书页,立刻被那个诡异的世界攫住了。

三个时代,三个来福,三头叫旺财的公猪。太平天国的烽烟里,土改的浪潮中,喧嚣的当下——人和猪的命运在时光里轮回。最让我震撼的是,他彻底抛弃了从前最擅长的静态描写。那个曾经把葛川江写得如油画般凝重的作家,如今让文字奔跑起来:“来福和旺财在田埂上走着,蚂蚁列队穿过血渍,时光在他们身后合拢又分开。”

这二十年他去了哪里?后来在他的博客里,我慢慢找到了答案。他的博客像个热闹的集市:今天晒一幅刚完成的油画,墨色淋漓;明天写一段买菜经,活色生香;偶尔还会抱怨学生的论文改得头疼。完全不是想象中苦大仇深的作家模样。有篇博文我印象极深,他说在匈牙利电影里看到一个男人赶着公猪走在村路上,“那个画面没有故事,只有节奏,像心跳一样朴素的节奏”。这一念,就是十年。直到某个学生问起:“老师,那个赶猪的故事你写了吗?”

原来最好的故事,需要等到能听懂它心跳的时候才动笔。我突然想起

胶东老家的渔民说过:最好的海参要等到季风转向时才捕捞。写作大概也是如此——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要急着破土,有些故事需要在时间里醒得更久。

《公猪案》里有个细节让我落泪:土改时期的来福,眼睁睁看着旺财被牵走,他什么都没说,只是蹲在地上,把猪槽里剩下的食渣一粒粒捡起来吃了。李杭育写:“有些痛是说不出的,就像公猪不会哭,只会更凶地撞向栏杆。”这哪里是在写猪?分明是写一代中国人沉默的坚韧。

这种对人性的体恤,或许正来自他日常的烟火生活。他的博客里,写作、画画、教书、买菜——这些事平起平坐。某天他写道:“早上改完稿子,发现葱不够了,赶紧去菜场。挑葱时要选根上带泥的,这样的香。”读到这里我会心一笑,这就是胶东人的实在:再大的才情,也要在一粥一饭里落地。

这让我想起他说的“写作的快感”。他说以前写作太苦,总想着要承担什么、表达什么,像扛着石头上山。现在终于明白,写作首先要快乐,是内心有东西要满溢出来的自然流淌。为了这种自由,他用了二十年挣脱“中国式写作”的桎梏——那种必须一个主题、一个事件、处处都要指向中心的手法。

《公猪案》就是他自由的证明。三个时代平行交错,没有过渡,没有解释,像三条同时流动的河。读者要在时光的迷宫里自己找路。他说这是“凌驾于文本之上”,我倒觉得,这是他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说话方式——像胶东老农讲故事,不讲章法,但自有筋骨。

去年秋天,我回了趟胶东老家。走在收获后的花生地里,忽然想起李杭育写过,他父亲总要把最饱满的花生留作种子。“留种的花生不能马上吃,要挂在通风处,等到来年。”这话像极了注脚——他把自己挂了二十年,不是为了风干,是为了等待最适合播种的季节。

如今再读他的博客,看他在书法、油画、教学和买菜之间自如切换,我渐渐懂了:一个真正的作家,最终要超越的从来不是别人,而是自己曾经熟悉的套路。就像胶东的海,潮涨潮落从来不是重复,每次带来的都是新的海藻、贝壳,和不一样的海风。

有时候我会想象,在杭州某个寻常的居民楼里,李杭育可能正对着画布调色,厨房里炖着汤,书桌上摊着未完成的手稿。窗外的桂花香飘进来,和松节油的味道混在一起——这就是创作最真实的样子:不是苦修,是生活;不是挣扎,是呼吸。